

#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徐井柱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管子》是我国古代一部经典的思想著作, 是对卓越政治家管仲治国思想的深入阐释, 全书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 并在这些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通过对《管子》深刻的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 从中可以学到“均地分利”的民生伦理、“强国富民”的生产伦理、“重农益商”的交换伦理、“俭侈有度”的消费伦理及“以劳授禄”的分配伦理等思想, 也可洞察管仲深厚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维。对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探寻与挖掘, 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契合, 对今天经济建设中的道德教育也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管子》; 经济伦理思想; 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B 226. 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3-0001-05

## An Analysis of the Business Ethics in *Guanzi*

XU Jing-zhu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As a Chinese ancient classical ideological work, *Guanzi* is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verning thought of Guan Zhong, an outstanding politician. The book involves various content of politics,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culture, and plenty of insightful discussions in these area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the incisive thought on business ethics in *Guanzi*,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we can see clearly Guan Zhong's simple philosophy thinking of materialism and absorb the thoughts such as the ethics for people's livelihood to practice agrarianism and profit sharing, the ethics in production to strengthen the country and enrich the people, the ethics in transaction to emphasize agriculture and encourage commerce, the ethics in consumption to advocate a moderate degree of frugality and extravagance, and the ethics in distribution to award the salary on the basis of one's merits and accomplishments. 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moral education in today's economic construction to explore and mine Chinese ancient business ethics and find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Key words:** *Guanzi*; business ethic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管子》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籍, 它包含大量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思想, 其丰富的经

济思想在中国古代书经子集中更是无与伦比。作为中华博大精深、理蕴醇厚的传统文化的一部

收稿日期: 2013-04-08

作者简介: 徐井柱(1988-), 男, 江苏连云港人, 江苏师范大学法律与公共事务学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社会发展理论。

分,它已随着社会与时代的革新,民族与现实的发展,而深深融合于人民经济生活的血脉中,吸纳为中华广袤土地上炎黄子孙心目中的民族历史之根、传统文化之脉、行为方式之迹。追寻与挖掘这块知识瑰宝中的经济伦理养分以滋养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深远价值不言而喻。

## 一、《管子》经济伦理思想前沿说明

任何思想文化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管子》的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也不例外,有着特殊历史环境的驱使。历史上素有“春秋无义战”之称,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经济变革急剧、诸侯争霸斗争频仍、社会发展因子蠢蠢欲动催生出学术上百家争鸣的盛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管子》应运而生,并伴随着动荡与生机并存的环境逐渐成长为杰出的文化成果。

《管子》一书篇幅巨大,内容庞杂,是一部涵盖经济、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等诸多思想的论文集。现存《管子》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大部分是战国时齐国管仲学派和齐稷下学者的假托之作,其中某些篇幅还涉及西汉文人的附益。但经《管子》研究者关锋等人严谨考辨,确认其中《经言》、《外言》、《大匡》、《中匡》、《小匡》等皆为管子言行的可靠记述。哲学家冯友兰也认为:“《管子》里面没有管仲亲笔写的文章,但是其中也有可以作为讲管仲本人思想和活动的材料。《论语》里面并没有孔丘亲自写的文章,但它是讲孔丘本人思想和活动的主要材料”<sup>[1]</sup>。就算《管子》有些篇章非管子亲为,但其中对管子为政时期经济、伦理思想的深刻论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也是宝贵的兼具学术性、思想性的经济伦理研究力作,具有很大的理论考究价值。

## 二、《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丰富内涵

1. 在“均地分利”的土地改革中体现民生伦理,最早提出朴素唯物主义命题

春秋战国时期长期的战争导致政治上的动

荡和社会上的变革,诸侯争霸割据一方,社会动荡混战,民生凋敝,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管子是春秋前期齐国杰出的实践政治家,也是中国古代难得的经济哲学家,他处于先秦时期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以家庭为本位闭塞的农业文明时代。当时齐国历经夏商周三朝以无偿奴隶劳动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后,生产落后,经济发展疲软,动力不足。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时局下,诸侯国齐却率先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上的繁荣,国内人民安居乐业,物资殷实,“通货积财、富国强兵”<sup>[2]326</sup>,国力振兴,并最早在中原一带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sup>[2]326</sup>的雄图霸业。其间掌政执相力主改革的正是《管子》深邃思想的主人公管子。

在社会农业发展层面,管子推行了“均地分利”、“相地衰征”的封建土地改革制度。“均地分利”即将土地大体均等分给劳耕者,评定地质的好坏,劳动者按照分得土地的优劣情况缴纳赋税。“相地衰征”即根据地质的好坏、产量的高低确定赋税的征收数额。这不仅为劳耕者提供了生活收入的来源,也调整了土地所有者与劳作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使百姓的收入增加,支出负担得到缓解,为他们追求劳动之余的精神享乐提供了可能,使他们逐渐具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也为后来启蒙思潮的传播奏响前曲。在此基础上,管子出台了编户行政管理政策,使农民阶层处所土地相对稳固,安心生产,国家也得到休养生息,物质基础不断充盈。也许有人会说,管子这一政策虽自上而下废除了奴隶主的食邑制,为那些遭受奴役压迫的贫苦奴隶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护,使他们获得身份上的自由与生存上的保障。但并不能说管子就是劳动者的代言人,他所推行的政策是为了他所处的新兴封建贵族阶级服务的,他不过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推行了改革而已,编户行政的管理体制仍然具有很深的社会等级歧视。但毕竟在这一政策的直接推动下,广大农民获得了较之奴隶社会相比较的人身自由,他们获得了地产,生产积极性提高,生活条件也逐步改善,一时出现“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憚劳苦”(《管子·乘马》)的社会局面确是不争的事实,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与民众道德

风尚的提高。新兴的封建贵族阶级虽然也剥削压迫民众,但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本身是一种进化,这种进化的标志是剥削形式的改进,相对于奴隶制剥削形式,封建的剥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在当时还是奴隶制的齐国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均地分利”的土地改革是当时百姓急切盼望的义举,不论对当时的齐国,还是后世发展完善的封建制诸侯国,这一政策影响都是深远、意义重大的。

《牧民》篇有句著名的话,即“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为政期间对生产关系作做出了重大改革,通过废除奴隶食邑制的羁绊,发展了农业土地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存条件,管子在致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兼顾社会伦理的道德诉求,在理论向度上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内涵。历史唯物主义遵循物质决定生存的意识、经济生产,认为其具有第一性;而对应的伦理道德、社会风化则处于从属地位,表现为第二性。这也表明,管子在社会范围和历史进程的向度具有原始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为其提供基础的基本理论思维。根据管子理论研究者关锋的观点,管子最早提出了天是自然存在没有意志的观点。这在春秋时代无疑为最先。管子是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代思辩哲学的杰出代表,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思想家、哲学家。在管子去世五年后,希腊才诞生因最早提出“宇宙的基本元素是水”的哲学命题而名噪一时的西方早期朴素唯物主义自然哲学家泰勒斯。毫无疑问,管子堪称是“世界唯物主义自然观之父”,这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

## 2. 在“强国富民”中实现“国治民安”的生产伦理

管子为政时主张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管子》中也一再阐述大力发展生产,增加物资储备,推行富民的政策。这样能为除暴安良提供条件,增强社会文明程度,最终实现以民治民的社会局面。

《管子》认为,治理国家当有“三慎”,其中一项便是“慎富”,即使社会创造财富。关于创造财

富的作用,《牧民》篇有过一段精彩表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段话历来为后人所颂传,脍炙人口。它指出治理国家必须注重生产发展,即“慎富”在于务地,应该大力开辟土地,补充财富的来源,人民才能有所保障,安居乐业。才不至因贫苦落魄而流离失所,相反却可以大量吸引外民,充实国内人丁,提高人口数量,进而促进生产的繁荣。这表明,社会丰厚的物质财富能够为道德文明的开化提供物质基础保障,一个社会若要引导人民崇德尚礼,引导人民养成知荣晓辱的精神文明意识观,形成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都不能脱离社会物质基础的支撑作用。如果一个社会连人们起码的吃穿都保证不了,那么何谈礼义廉耻,又何言社会的繁荣昌盛?当然,对此也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理解,认为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的道德素养便会自然跟着提升,觉得富人的道德水准就很高,而穷人则没有道德或道德水平低下,这些理解都不科学。但这毕竟为我们提供了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和社会发展基础的概念。

《管子》认为治国理政应该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摆在首位及主体核心的地位,即“慎富”为治国之本的思想,从当时齐国的具体情况观察,这一政策毫无疑问作用巨大。发展经济的策略不仅充实了百姓的生活资料,促进了社会的道德文明以及伦理纲常的发展,也为后来齐国图强列霸称雄于诸侯提供了厚重的物质基础。为我们后人解读《管子》提供了生产伦理视角的理解。

## 3. 支持工商业发展,“重农而不抑商”的交换伦理

《管子》深厚的农本思想历来为人们所熟知,如其指出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中首要的又是农业。即“理国之道,地德为首”思想。其次“均地分力”的土地改革思想、“观地宜”的农作思想等例子举不胜举。其实《管子》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并不轻视或排斥商业的发展,他把商人与士农工并行看成国家的基本民众。“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小匡》)。《管子》认为工商业是农业发展、军队建设和人民

生活的保障,亦是富国裕民的依靠,工商业作为国之四石之一,同样有着重要的社会功用。进一步提出税收方面应“驰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管子·大匡》)。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扶持商业发展,以吸引天下商贾。在物价管理方面,主张“轻重敛散之以时”,防止“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四百倍其本”(《管子·国蓄》)。在金融方面,更是主张铸造统一货币以便利商品交换的折算兑取。这些思想具有深厚的经济交换伦理思想。

由于《管子》长期实行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一时出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盛况,齐都临淄更一度成为东周列国都城中最为繁华的地方,城内“齐之临淄三百间,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sup>[3]</sup>。

#### 4. 倡导“俭则伤事,侈则伤货”的消费伦理观

在消费观方面,《管子》主张依据一定的经济形势,崇节俭与倡奢侈并重的消费观念,但又特别指出反对过度节俭与过度奢侈。如在《乘马》篇中便有说明:“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贵,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即认为社会群体的消费状况直接制约着当时货币的贵贱。觉得人们若过分节俭,那么消费便会下降,这时市场流通就会出现“金轻物重”的情况,物价就会上涨,结果会出现“物以稀为贵”的状况。这样的话会抑制百姓的需求,限制商业的生产。这时需要政府“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sup>[4]</sup>。“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扩展新兴服务消费,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sup>[4]</sup>。《管子》这些策略与我们今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坚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政策不谋而合。此外,《管子》也反对奢侈过度,认为侈则金贵,接着便会出现“金重物轻”,物价就会下跌,虽然利于需求,但对应增加了社会的剩余劳动力,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必然会减少,结果出现“货多不值钱”,因而“侈则伤货”也就不难理解。于生产和民众生活及道德教化而言其弊端不言而喻。《管子》倡导的“俭侈有度”的消费伦理思想,

对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中推行道德的约束,加强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宏观调控,进而引导市场道德机制健康有序的发展意义深远。

#### 5. “以劳授禄”的分配正义伦理

对于分配公正问题,《管子》同样也精辟的论述,主张按照劳动成果分配收入。在《君臣上》中指出,“布政有均,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矣。以劳授禄,则民不倖生。”对劳动者实行“以劳授禄”的劳动报酬制度,主张劳有所得,无劳不授禄。如此一来,人们便不会心存侥幸,大搞投机倒把的商业行为。“以劳授禄”的分配政策,能够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必然起到鼓励劳动教化民众的效果,长此以往,则“民足于产,国家丰矣”。这一分配政策,带有正义性的特征,能够有助提高人民的生产活力,引导社会个体积极向善、促进互尊互爱的伦理风尚的形成。反之也能对社会不端行为起到隐性约束的作用,从而倡导伦理道德健康有序发展。正如克拉克所说,“对于实事求是的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在各个要求获得应得权利的人中间分配财富的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sup>[5]</sup>。笔者再补充一句: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分配道义问题。也如罗尔斯在表述正义观的两个原则时所言,“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sup>[6]</sup>。

### 三、《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

对于《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探究与挖掘,能够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重要的理论来源与指导。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短暂,经济发展的制度层面还存有许多不足与漏洞。“当下中国,借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话说,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也充满着焦虑、不满,物欲的膨胀和精神的空虚并存,社会的生机与社会的溃败并存”<sup>[7]</sup>。因此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

不可避免地出现旧矛盾的没有及时解决与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之间的尖锐冲突。不论是国营控股经济还是私人资本经济成分,他们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利润驱动下,源于追求“自身利益”、“个人利益关系”的利己人性的基本动机下,在角逐利益过程中,必然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协调,甚至可能出现反社会、反集体利益的行径,例如社会问题中因经济利益纠纷而酿成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便是例子。最终造成的是伦理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乃至社会的自然失衡或自然秩序的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们的利己的本能和天性。而这些市场独立成分在盘算各自利益领地的时候,毫无章程可循,“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sup>[8]</sup>。我们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中不难看出,在市场经济中,不论是那只看不见的利己心之手支配个人行为,还是另一只看不见的竞争过程之手对市场机制的驱动,都必然会带有某种随意性与不确定性,那么他们在利益动机的直

接驱使下肯定会毫不犹豫、毫无限度地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它们根本不管这一过程能否带来或将会带来哪些有利于社会成员的方面,在它们的眼中,惟有利益与金钱。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商业的本质是逐利的,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sup>[9]</sup>。这必然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与伦理道德的失范,不论对于经济行为还是人性的道德都将造成巨大的伦常规范的滑坡。

所以,加大对《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认真反思与总结其现实解决的路径与方法,旗帜鲜明地批判经济发展与伦理道德背离的内容,进一步寻求以科学创新的理论视角,指导国内的市场经济便带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倡导建立与形成同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相适应的文明、有效的经济伦理发展模式,这对于国内经济的健康、协调、有序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9.
- [2](汉)司马迁. 史记:管晏列传[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 [3](春秋)晏婴.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M]. 汤化,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401.
- [4]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10-28(1).
- [5](美)克拉克. 财富的分配[M]. 陈福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1.
- [6](美)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58.
- [7]邓聿文. 新政府的挑战[EB/OL]. 财经网评论[2013-3-26] <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3-03-26/112622048.html>.
- [8](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 [9](德)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839.